

#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孙锡芳

(长安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穀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关键词:** 刘文淇;《左传》;扬州学派;《春秋左传旧注疏证》

中图分类号: K207.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1)03-0061-05

## The Analysis of Liu Wenqi's Academic Thought on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SUN Xi-fa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Liu's family in Yizheng, Jiangsu provinc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Yangzhou school in Qing Dynasty and is expertise in the academic study of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Starting from Liu Wenqi, it took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y to write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Embodying their academic thought and research features, the book is the collation and summary of sort of Confucian commentaries on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in Qing Dynasty.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book, the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Liu Wenqi's academic thoughts consist of three aspects: 1) the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is based on the Book of Rites of Zhou Dynasty; 2) the thoughts in Gongyuan'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and Kuliang'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are arguable; 3) the criticism and praise of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can be read in the annotation by Jia Kui.

**Key words:** Liu Wenqi;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the school of Yangzhou; *The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Zuo's Exegesis of Chun-qi Annals*

收稿日期: 2011-01-06

基金项目: 长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B1002)

作者简介: 孙锡芳(1977-),女,山东诸城人,历史学博士,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清代《左传》学研究。

刘文淇(1789-1854),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少年家贫,跟随舅父凌曙学习。稍长,即精研古籍,贯串群经,于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学说,博览冥搜,实事求是,与刘宝楠并称“扬州二刘”。刘文淇治经学以《左传》著称。对此,张舜徽先生有过介绍,他说:“文淇出身的时代,较以前所述汪(中)、焦(循)、王(念孙)、阮(元)诸家较晚,他在嘉道间没有什么高的科名,仅仅是一名优贡生,以课徒游幕为生。但在经学研究方面,却为当时学术界所推重,特别是研究《春秋左氏传》,是他一生专门之学,有大名于当时”<sup>[1]</sup><sup>175</sup>。所以,当清代学者致力于重新注疏儒家经典时,刘文淇极为关注《左传》的注疏情况。他认为“《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他在编著《左传旧疏考证》的基础上,对《左传》进行了重新注疏。《清史稿·儒林传》记载:“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歿”<sup>[2]</sup>。卷四百八十二由此可见,刘文淇首先写了《长编》数十巨册,然后才据此为提纲,撰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考证》)。他写到隐公四年便去世了,其子刘毓崧(1818-1867)、孙刘寿曾(1838-1882)又续写至襄公四年,所以,《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最终还是一部未完之作。

刘文淇及其子孙所著《疏证》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是清代《左传》新疏之代表。该书著述内容丰富,特点极为突出,采用传统的“注”、“疏”相结合的编纂体例,对《左传》内容进行了重新解释,体现了刘文淇及其子孙对《左传》的认识及其主要观点。目前学术界对《疏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容和体例方面,而对作者的《左传》研究思想则涉及很少。本文拟从该书编纂内容出发,深入剖析作者(主要是刘文淇)的《左传》研究思想。

概括而言,刘氏的《左传》研究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

礼乐制度是西周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君王权威的维护和对

等级制度的认定。礼制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春秋时代的典籍多有反映:“夫礼,国之纪也”<sup>[3]</sup>晋语四,“夫礼,所以整民也”<sup>[4]</sup>庄公二十三年,“礼,政之舆也”<sup>[4]</sup>僖公十一年,“夫礼,国之干也”<sup>[4]</sup>襄公二十一年,“夫礼,王之大经也”<sup>[4]</sup>昭公十五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sup>[4]</sup>隐公十一年。可见,当时学者们已经把礼看成立国为政的依据了。礼乐制度在春秋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它是当时社会道德和是非的主要判断标准之一,所以,人们崇尚于“礼”的学习和研究。据《左传》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sup>[4]</sup>。昭公二年当时来鲁国学礼问乐的人很多,如吴国的季札来“问周乐”,齐国的晏子在边境狩猎时,也“因入鲁问礼”。由于求学者纷纷来到鲁国,也促使鲁国更加讲求礼乐,大贵族孟僖子就“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这都表明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重要性。

但是,春秋末期,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旧的社会体制不断受到冲击;随着周王室的衰微,权力和财富开始在诸侯及卿大夫之间进行重新分配,导致了“礼坏乐崩”的局面。面对这种社会变革,当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礼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孔子《论语》中谈礼的言论就非常多,有不少是与赞扬、提倡和维护周礼有关的。此外,孔子对当时社会的僭越非礼行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套“正名”方法。“正名”就是正名分,就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孔子崇尚周公,主张通过“复礼”来维护西周的社会统治秩序。《春秋》经的编撰集中体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孟子》记载: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sup>[5]</sup>滕文公下。

可见,孔子编纂《春秋》,是因为看到了春秋末期世道的衰微,以及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他想通过《春秋》的“微言大义”达到使“乱臣贼子惧”的目的。纵观《春秋》经传的内容,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孔子希望通过恢复礼乐制度来解决春秋末期的社会历史问题。他以“礼”为标准来衡量春秋的治国、外交、军事等大事,并以褒、贬反映这一深刻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对于晋国铸刑鼎、著刑书有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贵贱无序,何以为国?”<sup>[4]</sup>昭公二十九年所以,《春秋》、《左传》与《周礼》有密切的联系。刘文淇以他对《春秋》经传的深入研究,敏锐地意识到了其中的关系,在《春秋左传旧注疏证》的注例中,他明确地提出: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周礼》者,文王基之,武王作之,周公成之。《周礼》明而后乱臣贼子乃始知惧。若不用《周礼》,而专用从殷(《公羊》家言《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殊误。)则乱臣贼子皆具曰‘予圣’。而藉口於《春秋》之改制矣。(《郑志》曰:《春秋》经所讥所善,皆於《礼》难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书之,当按《礼》以正之。(所谓《礼》即指《周礼》)”<sup>[6]</sup>注例。

由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整理本对于此段注释说:“原稿眉批:‘哀公十四年疏称贾逵、服虔、颖容等皆以为孔子修《春秋》约以《周礼》’。”可见,刘文淇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周礼》为根本精神的,所以他提出“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的研究方法,这也是《疏证》作者阐发《左传》义理思想的基本原则。

学术思想具有传承性,后人的研究成果总是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的。孔子以“礼”作《春秋》之根本精神,“三传”之中都有类似的阐释。孔颖达编撰《正义》也认为礼是《春秋》的根本,他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则必尽其敬,戎则不加无罪。盟会协於礼,兴动顺其节。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帝王之明鉴也”<sup>[7]</sup>序。宋明诸儒虽不讲考据,但其探求《春秋》大义同样离不开礼的规范。到了清代,这种学术观点就更加明朗化了,学者们强调研究《春秋》应

与礼学会通。清初,徐延垣在《春秋管窥》序中曾说:“窃窥《春秋》一书,与《礼经》相表里。礼存其体,而《春秋》著其用。故必先达于礼,而后能达于《春秋》也”<sup>[8]</sup>242。可见,徐延垣非常重视《春秋》与礼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形象地概括为表里关系也是较为贴切的。徐延垣之外的清初学者,还有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提出过礼与《春秋》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相关论述和刘文淇的思想还有很大区别。万斯大、毛奇龄等人所注重的是对《春秋》和《左传》中所记载的礼制礼仪等文义的解释。实际上,对刘文淇《左传》研究产生过直接和重要影响的莫过于清代《左传》名家沈钦韩。沈钦韩在为惠栋《左传补注》所作的序中曾说:“后之学者,舍礼而言《春秋》,于是以《春秋》为刑书,以书法为司马空城旦之科”<sup>[9]</sup>自序。刘文淇与沈钦韩曾通过书信往来请教为学之道。沈钦韩鼓励刘文淇进行《左传》研究。而刘文淇在致沈钦韩的信中说:“《疏》中所载,尊著十取其六”。可见刘文淇作《疏证》吸取了沈钦韩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在对待《春秋》经传与礼学的关系问题上,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左传》所记载礼制的意义层面,并在阐明《左传》文义的基础上探求孔子作《春秋》的根本精神所在。这与万斯大、毛奇龄等人仅探讨《春秋》经传中所载礼仪、礼制文义的研究相比是质的不同。

刘文淇《疏证》中多处运用了“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的研究方法。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从礼制仪式入手,通过征引《周礼》、《仪礼》以及《礼记》中的文献,参考各种礼仪(主要包括祭祀祖先、敬奉昊天之仪式、婚丧礼仪以及诸侯使节往来朝聘的礼仪等等),并在此基础上考证《左传》的记载。例如,刘文淇对隐公二年《传》“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卿为君逆也”条的考证:

“哀公问:冕而迎亲。《疏》,昏礼迎妇。二传不同,《春秋公羊》说:“自天子至庶人皆迎亲。”《左氏》说:“天子至尊无敌,故无迎亲之礼,诸侯有故,若疾病,则使上卿迎。上公临之。”许氏谨案:“高祖时,皇太子纳妃,叔孙通制礼,以为天子无迎亲。”从《左氏》义也。驳之云:“大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亲迎于渭。即天子迎亲明文也。引

《礼记》:冕而亲迎,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非天子则谁乎?如郑此言,从《公羊》义也。又《诗》云:“文王迎亲于渭,纣尚南面,文王尤为西伯耳。”以《左氏》义为长,郑驳未定”<sup>[6]8</sup>。

作者通过征引《礼记》的相关内容,考辨了《左传》与《公羊传》对《春秋》经中关于天子有无迎亲之礼的不同解释,并以《诗经》所记文王迎亲之时还不是天子,反驳了郑玄的观点,最后认为“《左传》义为长”,即“天子至尊无敌,故无迎亲之礼,诸侯有故,若疾病,则使上卿迎”。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是刘文淇研究《左传》的突破性贡献,也是清儒注重礼学研究在《左传》研究领域的重要体现。通过这种方法,刘文淇及其子孙解决了不少《左传》旧注旧疏所没有解决的问题,阐发了《左传》的义理思想,这对于《春秋》经的理解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二、《公羊》、《穀梁》之义理不能尽信

相传,《春秋》是孔子据《鲁春秋》编纂而成的。《春秋》中,文、史、义三者达到了融合与会通。孟子曾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sup>[5]离娄下</sup>。也就是说,孟子认为孔子修《春秋》体现了文、事、义三者的结合。但是,传统上,一般认为《三传》之中,《左传》属事,而《公》、《穀》二传释其文与义。清代学者也多持此种观点。唐宴曾分析说:“孟子之说《春秋》也,分其事、文二者。盖事者,当时之事,如《左氏传》所载是也;其文,《春秋》所书是也。故《公》、《穀》二家所传者,其文。而《左氏》所传者其事。此固了然可辨者。自后人不善读之,以三传并列,而文事不分”<sup>[10]401</sup>。唐宴虽没有直接说《春秋》之义的归属,但是从其上下文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唐宴认为《春秋》之义应在《公》、《穀》二传。刘文淇一反这种传统观点,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观点。他认为《春秋》兼有文、事、义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左丘明亲见策书,所以其事可信;而依据确而可信的事实,必能推知圣人的微

言大义。正如他在注例中所言:

“《春秋》有事、有文、有义,义虽孔子所窃取,然必依文与事言之。左氏亲见策书,所记事文,多可依据。若《公》、《穀》之作,当战国时,其所述事文,未能尽确,则其义虽优,则亦恐有郢书燕说之患”<sup>[6]注例</sup>。

很显然,刘文淇不但认为《春秋》有事、有文、有义,而且明确提出《左传》之事、文较其它二传更为可信。在论述这一观点时,刘文淇从《左传》的作者及三传的成书年代入手,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左传》作者左氏曾亲见策书,所以,《左传》成书年代较早、所记文与事的可信度较高。《公》、《穀》成书在战国时代,其所记文与事不能尽确。据此发挥出来的义理思想虽然很好,但不一定是《春秋》本来之义,存在“郢书燕说”之患。故而,《公》、《穀》之义理不能尽信。

总而言之,《疏证》作者尊信古文,认为《左传》内容与《春秋》经文较符合,从而抬高了《左传》的解经地位。但是,不可否认,《左传》与经文记载的确还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对这种现象也有自己的解释:经与传的不同,是后人窜改的结果,不是《左传》古文的原貌。例如,桓公三年《春秋》记载:“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璧假许田。”旧注引《史记集解》糜信云:“郑以祊不足以许田,故复加璧。”作者考证说:

“按《传》疏云:“祊薄于许,加以璧,易取许田,非假借之也。今《经》乃以璧假为文,故《传》言为周公祊而解《经》璧假之言也。”疏言今《经》以璧假为文,是《古文经》作加。杜氏云:“以璧假为文,时之所隐。”失之”<sup>[6]81</sup>。

在此年传中记载:“三月,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祊故也。”作者认为:

“假”当作“加”,杜於《经》既不从古义,故《传》亦改作假。以《公》、《穀》二传皆作“假”。注谓称“假璧,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亦用《公》、《穀》义”<sup>[6]83</sup>。

由此可见,根据糜信的说法,在古文《经》中,“假璧”原作“加璧”。而在《公羊》和《穀梁》的今文经中才作“假璧”。作者认为,《左传》现在之所以也作“假璧”是杜预根据《公羊》和《穀梁》窜改

的,都有失《经》文之义。

### 三、《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刘文淇强调《左传》有深刻义理思想的同时,认为《左传》所具有的褒、贬释《经》之义例是成书时就有的。汉代刘歆作《春秋左氏传条例》阐发《左传》注经的义例,贾逵则超越了刘歆,对其《春秋左氏传条例》作了进一步阐释。刘文淇对此概括说:

“褒、贬、抑、损之义,三《传》所传《春秋》皆有之。注《左氏》者,惟贾君尚存梗概,后人议其杂入《公》、《穀》之说,为自淆家法。实则左氏本有其义,而贾君传之,非贾君好为合并也”<sup>[6]</sup>注例。

可见,刘文淇认为,《春秋》本有义例,三传释经必然也各有义例。《左传》之义例或有与《公》、《穀》相近或相似者,但并不是贾逵袭取《公》、《穀》二传,而是贾逵之注保存了左氏旧说。所以三传相似的义例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春秋》经的义例。但这只是三传在阐释《春秋》经旨方面所具有一些相似性。刘文淇更注重的是三传的不同,他认为三传在义理思想和褒贬义例方面各有所承,内容自然不尽相同。刘文淇与沈钦韩曾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

“至若《左氏》之例,异于《公》、《穀》,贾、服间以《公》、《穀》之例释《左传》,是开其罅,与人以可攻。至《春秋释例》一书,为杜氏臆说,更无论矣。文淇所为《春秋左传旧注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故,而不言例”<sup>[11]</sup>卷四。

显然,刘文淇认为《左传》与《公羊》和《穀梁》有着不同的义例。他批评贾逵、服虔沿用《公》、《穀》解释《左传》的义例来阐释《左传》。也就是说,刘文淇认为贾逵注虽然传承了《左传》的义例,但是其中还存在根据《公》、《穀》所立之义例,所以要区别对待。至于杜预对《左传》义例的阐释,刘氏则持全面否定的态度。《疏证》中,作者很少专门涉及对《左传》义例的分析。因为刘文淇曾有这样一个规划:《疏证》“专释训诂名物典故,而不言例”,“其《左氏》凡例,另为一表,皆以《左氏》之例释《左氏》,其不知者,概从阙如”<sup>[11]</sup>卷四。其子刘寿曾曾作《春秋五十凡列表》,但可惜的是,该书已经亡佚了。

总之,《疏证》历经刘氏几代人共同努力,在炳承乾嘉学术风尚的基础上,上稽先秦诸子,下考汉唐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疏证旧注,发表《左传》研究新见,在清代《左传》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张舜徽. 清代扬州学记[M]. 扬州:广陵书社,2004.
- [2]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3]左丘明. 国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5]杨伯峻. 孟子译注[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 [6]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等. 春秋左传旧注疏证[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7](唐)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M]. 十三经注疏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8]曾圣益. 仪征刘氏春秋左传学研究[D]. 台北: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 [9]惠栋. 左传补注[M].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10]唐晏. 吴汉民点校. 两汉三国学案[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刘文淇. 青溪旧屋文集[M]. 刻本. 1883(清光绪九年).